

##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 铁血丹心映青史

### ——台儿庄战役57人敢死队队长王范堂的故事

记者 周健

“我父亲是台儿庄战役敢死队队长。在台儿庄战役的关键时刻，他率领的57人敢死队，消灭了占领西北角的敌人，打通了大会战部队之间的联系。”在谈起抗日战斗英雄的战斗事迹时，1956年出生定居在汉中市王范堂的二儿子王春宣如是说。

王范堂是石泉县后柳镇人，先后参加了卢沟桥防御战、娘子关歼灭战、武汉保卫战、中原运动战等著名战役。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正酣，王范堂率领57名敢死队员，在夜幕的掩护下，向占据台儿庄西北角的日军发起了惊心动魄的攻击，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 投笔从戎赴国难

王范堂原名王模，1908年12月出生在后柳镇一个小商人家庭。1926年从石泉县第一高等小学堂毕业后回到后柳镇石佛寺小学任国文教员。在学校里，自幼喜爱舞文弄墨打抱不平的他毅然报考了西北军官学校，决定拿起武器报国安民。

毕业后，他随西北军出潼关。由于他拼博作战，勇敢顽强，很快就由排长升为连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王范堂正在武汉军校带薪学习。“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民族自尊心驱使他决定到抗战的最前线去。在会同一批学员向校方呈递参战请求书，申请提前离校奔赴抗战最前线后，便接到了上级停止学习立即返回部队的命令，他和其他学员一道扛着行李前往部队。

王范堂赶到部队后，才知道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北平、天津已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战斗规模不断升级，随时都有可能沦陷。第二十七师奉命在保定地区良乡一带布防，王范堂所率的七连就在良乡琉璃河畔，离卢沟桥只有30多公里。一天，在七连前沿阵地突然发现一支日军骑兵小分队，有10来个人，一个个骑着日本战马，耀武扬威地窜来窜去。这时，王范堂已到琉璃河10多天了，一直没有和日军正面交战，战士们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没等日军骑兵全部进入火力网，就迫不及待地开枪射击。前面的几个日军应声落马，后面的日军抛下同伴的尸体落荒而逃。这次战斗全连击毙日军骑兵3人，缴获战马3匹，是第二十七师最早缴获的日军战马。

北平沦陷后，华北战局急转直下，日本侵略军乘势向西推进。王范堂所在的第二十七师由保定良乡撤到石家庄集结待命。到了1937年10月，奉命向山西太原转移。在部队进入娘子关地区的第3天上午，发现有一支日本军队正在山沟里的村庄宿营。黄樵松果断下达命令，发起进攻信号。霎时间，所有轻重武器同时向村里的日军开火，沟内日军一片混乱。这时，有一股日军冲出村口，向沟东逃窜，七连受命作

为先锋绕到沟东，抢占山口，堵截溃逃日军。王范堂命令三排正面迎敌，实行紧急堵截。三排士兵一边冲锋，一边射击，和日军混战在一起。王范堂亲率一排、二排迅速赶到，将残余日本兵赶回村内。此时，冲锋号已经吹响，友邻部队呐喊着冲下山坡，日军被团团围困在村内。经过近50个小时的战斗，歼灭日军一个联队约1000人。在这次战斗中，作为先锋连连的王范堂，实现了与日军正面作战的夙愿。

#### 挥枪舞刀杀敌寇

台儿庄是山东省南部的一个小镇，是徐州的门户，军事位置十分重要。1938年3月，日寇在这里摆下了两个精锐师团，要和中国军队决战。

3月27日清晨，日军攻破台儿庄北门，我方部队与日军展开激烈搏斗，形成拉锯战，虽经多次反击均未能将日军赶出庄外。部队伤亡惨重，形势十分危急。此时，庄外各部均遭到日军猛烈炮轰。二十七师前后阵地也与日军发生激战。当天上午，黄樵松命令158团三营七、八两个连增援庄内守军。由于庄内地形复杂，而且敌我双方已交织在一起，八连先行一步，不了解情况，盲目进入庄内，遭到日军机枪火力伏击，不到半个时辰，官兵牺牲殆尽。七连连长王范堂立即带领七连冲进庄内投入战斗。

3月28日黎明，日军由西北角向西南方向猛攻，妄图切断庄内守军与三十一师部队的联络，置庄内守军于死地。守城指挥部迅速调集部队从两侧组成轻重机枪火力封锁网，封锁日军进攻路线，同时命令七连在正面进行阻击。王范堂接受命令后，他利用有利地形组成火力网，并有重点地配备兵力。就这样在友邻部队的大力配合下，经过2天3夜的激烈战斗，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守住了阵地。激战中，王范堂率领的全连官兵130多人仅剩57人。

3月31日拂晓，日军停止了正面进攻，前沿阵地一片寂静。七连只剩57人，困倦已极，倒地便睡。正在此时，王范堂发现阵地前100米左右的开阔地带出现多条纵横交错的壕沟，偶尔可见日军军旗在沟内晃动。很明显，日军已改变策略，想通过构筑坑道向前逼近。王范堂当即向守备指挥官王冠五报告，并建议尽快集中庄内迫击炮，轰击阵地，摧毁敌人坑道，然后组织轻重机枪射击，歼敌于坑道内。王冠五采纳了他的建议，用猛烈炮火进行轰击，粉碎了敌军的阴谋。

为了彻底击退由西北角侵入的日军，王范堂把阵地上仅有的几个班长、排长召集到一个破屋里说：“我们只有57个弟兄了，现在守备指挥部要决死夺回丢失的阵地，大家只有以死相拼了！”几个班长、排长说道：“连长，反正进也是死，退也是死，守也是死，连长说咋办就咋办！”其实王范堂早就想好了，对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部下说：“我们是中国

军人，干脆57个人组成敢死队，就在今天晚上，杀进西北角阵地，拼他个鱼死网破，为国争光，为死难将士报仇，夺回阵地！”

王范堂立即爬过墙屋洞角和弹坑，用电话向长官作了请示，提出了交出防地，组建敢死队的建议。师部批准了王范堂的请战要求，并当即下令：由王范堂担任敢死队队长，连夜出击。57人敢死队组织起来后，队长王范堂郑重宣布：“我们是敢死队员，敢死队员就是要以死报国！”

当日，趁着夜幕，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王范堂率领的57名敢死队员，迅速到达了目的地。此时，敢死队与日军仅一墙之隔。为了有效杀敌，王范堂将敢死队划分成6个战斗组，分别选择了越墙地点。掩护他们的炮声停止后，6个小组同时从掩体内飞驰而出，越过城墙与日军厮杀在一起。敢死队员们见敌人举刀便刺，抬枪就打，一个劲地向前冲。王范堂带着几个战士刚冲进一条坑道，迎面就来了七八个日军。王范堂大声命令7个杀鬼头的敢死队员：“趴下、快趴下！手榴弹！”10多颗手榴弹飞向敌群，日军又倒下了一片。王范堂又大声命令：“弟兄们，冲！”敢死队员杀一阵、冲一阵，很快6个小组就推进了二三百米。

在炮火的掩护下，王范堂冲杀在前，他手握大刀，右一劈，左一劈，鬼子还没伸直腰，就倒在地上，敢死队员照着队长的样子，杀出一条血路，堵住退敌，用枪射、用刀砍，整个西北角杀声震天、炮声震天，敌人不知我军上来多少，只顾后退，狼狈逃窜。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搏斗，日军丢下60多具尸体，向北狼狈逃窜。偷袭取得了成功，夺回了西北角阵地。在这次战斗中，57名敢死队员仅剩13人生还。

“敢死队夜袭日军大获成功，清除了攻占台儿庄西北角的全部日军，保证了台儿庄内外中国抗日军队的联系，奠定了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基础。”王春宣说，“在台儿庄大会战后，父亲先后被提升为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直到副师长。在抗日战争的决战阶段，他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等许多重要战役，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重拾毛笔写史料

1949年12月，王范堂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12月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



王范堂生前戎装照

级学校军事教官。1952年7月，王范堂响应组织号召，转业回乡。他携妻刘先涛回到阔别已久的石泉，参加地方建设。后上级安排他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3年底结业后，分配到汉中工作，1955年担任汉中市文化馆副馆长。

王范堂到汉中，便一头扎在文化馆里，想用昔日的敢死精神，为发展汉中地区的文化事业作一番努力。一年里，他有一半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跑遍汉中市200多个生产大队，在农村积极组织文艺宣传活动，闻名全国的“汉中张寨农二哥诗社”就是由他组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退休的王范堂决定用有限的精力，将自己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事件写成回忆录，传给子孙后代。在随后的几年里，他根据自己的记忆写出或口述了《在抗战的最初日子里》《我率领的五十七人敢死队》《忆张慧民》等多篇史料文章，有的在《人民政协报》《团结报》发表，有的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汉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石泉县县委等单位收录进专著，为研究台儿庄战役及抗日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1987年，80岁高龄的王范堂突发脑出血，被病魔夺去生命。

时光荏苒，英雄已逝。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80周年，作为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光辉历史早就载入史册。王范堂的奋斗事迹及其在台儿庄战役中所作的贡献，必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 从陕南山区走出的抗日部队

李在安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在秦岭南麓的安康、商洛和汉中接合部的10余个县的边界地区，活跃着一支革命队伍。这支队伍在何继周（后改名何振亚）、沈启贤的带领下，打土豪、分田地，与地方反动武装搏斗并逐步发展壮大，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命名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们走出陕南，汇入洪流，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并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立下了不朽功勋。

#### 革命力量的悄然积聚

1931年3月，何继周、沈启贤、徐海山、孟子明等陕南籍进步青年，满怀报国之志，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军官训练班。“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员学员们义愤填膺，何继周、沈启贤等人也深受触动，开始深入思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心中的革命种子悄然发芽。

1932年11月，在安康绥靖军一团（即沈玺亭团）担任排长、排长的何继周、沈启贤等，进入沈玺亭团在平利县城举办的干部教育班受训。在曾参加过宁都起义的教育班大队长张惠民的教导和影响下，他们对革命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

12月初，贺龙率领红三军经过安康东南部进入四川。这一消息在教育班学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学员们纷纷议论，

对红军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沈启贤敏锐地意识到，这或许就是他们一直苦苦追寻的革命力量。于是，他积极联络何继周、孙善堂、徐海山等志同道合的战友，秘密组织了“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次年7月，平利干部教育班结业，“赤卫团”成员按照计划分配到该团各连担任班、排长。从此，他们在下层军官和士兵中秘密开展联络工作，如同在黑暗中埋下一颗颗革命的火种。

#### 游击纵队的英勇奋战

1935年，是陕南地区革命斗争的重要转折点，也是陕南游击纵队诞生的关键年份。这一年何继周等爱国官兵亲眼看见了红二十五军的英勇善战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他们对红军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12月7日，当四团开往柞水县，先到达营盘营的四连，在七班班长张子新和士兵王展（王武林）的带领下，一个排当夜毅然先行起义。时任九连二排长的何继周，敏锐地察觉到了形势的紧迫和时机的难得。他急忙约沈启贤、洪九畴等密议，决定九连全连起义。随后，他又召集苗鸿鑫、刘炎德、赵振庆等人，详细研究部署起义计划和措施。12月11日夜，何继周先派刘宝山、周明钧、傅东山、赵振庆在引驾回农民刘世杰家（连部）处决了反动连长张锡武。随后，他们以“执行任务”为由，率全连100余人起义，迅速撤出引驾回，向秦岭山区进发。

起义部队进入秦岭山区后，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然而，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寻找出路。此时红二十五军已离开陕南，何继周与在鄂豫陕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取得联系，请求改编和接受领导。红七十四师组建不久，力量单薄，加之对何部不了解，表示干部很少无法派出，建议何部先不宜打红军的旗号，可以“陕南游击队”名义开展活动。至于是大队、支队还是纵队，由何部自定。根据红七十四师的建议，何继周即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何振亚”，表达了他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定信念。

陕南游击纵队进入陕南后，他们以红军为榜样，在镇安、柞水、宁陕、石泉、汉阴、安康等县广阔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在此期间，游击纵队通过推行官兵平等原则，开展勤务运动、严明军队纪律、宣传和发动群众等举措，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群众纷纷主动为他们提供情报、掩护伤员，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也照亮了群众心中的希望，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意识。

经过三四个月的游击活动，陕南游击纵队不断发展壮大，队伍发展到500余人，编为5个中队。随着部队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成了陕南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

####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诞生

1936年5月，原在陕西西四团手枪连任班长的沈

敏，从沈启贤的战斗中得知陕南游击纵队被安康专署收编的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这支队伍的潜力和困境，毅然从北平急回西安，四处奔走，找到了杨虎城宪兵营营长金国生。金国生是中共党员，沈敏向他详细讲述了游击纵队的情况，请求解救这支队伍。金国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同中共党员杨江、杜瑜华向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书记谢华请示。

西北特支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派杨江、杜瑜华和沈敏到陕南做何振亚的工作，争取把这支部队掌握在党的手中，并指定由杨江总负责。6月初，杨江等3人肩负着党的使命，历经艰辛，到达安康东镇。此时的陕南游击纵队正处于迷茫与困境之中，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和收编阴谋，他们急需正确的指引。何振亚、徐海山等纵队领导得知杨江等人的来意后，态度明朗，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党的领导。

7月初，杨江赴西安向中共西北特支汇报工作，详细阐述了陕南游击纵队的情况以及何振亚等人接受党的领导的坚定决心。8月9日，部队对外声称赴安康整训，撤离东镇，夜宿茨沟。就在这关键时刻，杨江带杜超超回部队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立即举行第二次起义，并以“西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名义，命名组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并任命何振亚为军长，杨江为政治委员，杜瑜华为参谋长，沈敏参与领导协助何振亚工作。

何振亚、徐海山等完全赞同并接受西北特支的指示和任命。8月13日，部队在镇安县紫荆乡刘家大院（今属汉滨区），举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正式成立大会。会上任命部队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何振亚任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军长，沈敏任军委主席兼宣传科科长，杨江任组织科科长，杜瑜华任参谋长，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傅东山任供给处处长。军下辖4个支队和一个特务队、一个侦察队、一个少年先锋队。会上还发布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宣言》和《告民众书》，向全国人民宣告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成立和他们的抗日决心。

#### 汇入时代洪流奋勇前行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之后，宛如一把锋利的宝剑，挥戈北上，在镇安、宁陕、石泉交界山区与敌周旋。在和国民党及其地方武装的战斗中逐渐壮大，由500余人扩大到八九百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也密切关注着事变的进展。12月20日，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人徐彬如以“西救会”名义在西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首次披露在陕南有一支民众武装组织——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12月下旬，中共西北特支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关系交给了中共中央代表和红军代表团，由中共中央代表罗瑞卿同志负责接收。为了阻止南京方面的部队西进潼关，中共中央代表命令“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改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迅速赶往潼关以东参加

破坏铁路行动，以阻止敌人的进攻，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有利条件。

1937年1月，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根据红七十四师的指令，从安康北山出发，昼夜兼程向蓝田开进。2月初，主力部队到达长安县子午口后，杜瑜华、沈敏从西安返回部队，传达了上级新的命令：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第一军归红十五军团领导。2月9日晚，部队顺利过咸阳桥，次日中午抵达礼泉县叱干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合。红十五军团首长对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高度的赞扬。军团长徐海山亲自接见了何振亚、沈启贤等部队领导。红十五军团领导派来了李雪三等十几名军政干部，加强了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的领导力量。

1937年2月，经徐海司令员和李雪三政委介绍，沈启贤、何振亚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月初，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在甘肃庆阳驿马关进行了改编，正式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李雪三任政委，沈启贤任参谋长，杜瑜华、张英勃在政治处工作。部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使战士们在艰苦的训练中不断成长和进步。

“七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正式打响。红十五军团警卫团编为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8月，警卫营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

1940年，八路军一部奉命南下支援新四军，三四四旅扩编为第二纵队，警卫营扩编为新六八八团，归新四军三师建制。新六八八团在新四军三师的领导下，继续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他们参加了多次战斗，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军和伪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中国人民迎来了久违的和平。然而，和平并未持续太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妄图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新六八八团又投入到了解放战争的斗争中，他们跟随第四野战军转战南北，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要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新六八八团的战士们不畏强敌，英勇奋战，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入侵朝鲜，并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这支部队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第三十九军一一七师。在云山地区，三十九军打响了解放战争第一仗“云山战斗”，重创美军号称“常胜军”的一个联队，俘虏美军2000人，还歼灭韩军一个师，取得了云山战斗的胜利。此后，三十九军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奋勇作战，他们参加了多次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一一七师改为武警部队，驻守辽宁。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从成立之初的艰难探索，到转战陕南的英勇斗争，再到融入抗日洪流，投身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他们始终坚定地站在抗日和革命的最前线，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系安康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原秘书长）